

符号系统理论与文学反映的过程

诺拉·克劳索瓦 (Nora Krausova) 著

陆优然 (Jiri Lutka) 译 傅其林 校

摘要：文章主要通过苏联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方法论探讨了文学反映的复杂内在机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符号学的重要问题。它探讨了故事与话语的辩证关系，思考故事演变为作品话语的符号意指过程。话语作为文本显在的系统只能通过潜在的故事系统的支撑而生存，如果没有故事这个基础性的、深层的、生成性的系统，文本话语只是一链缺乏叙事结构的句子、非符号化的文本，只是纯粹的言语行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学反映，叙事

Theory of Sign System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ture Reflection

Nora Krausova

Translated by Jiri Lutka and Fu Qilin

Abstract: After inquiring about the complex internal mechanism of literature reflection, this paper adopts Soviet-style semiotics in use since the 1960s to consider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literary semiotics—the dialectic relation between story and discourse, and the evolution of story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cess in the work of discourse. As the evident system of text, discourse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potential system of stories. If literary discourse lacks the fundamental, deep and generative system of stories, it is merely a string of sentences without narrative structure, a non-symbolized text or even pure verbal behaviour.

Keywords: Marxism, semiotics, literature reflection, narrative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1002

我们在进行跨领域的研究时初步使用符号系统理论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符号系统理论是生产力很高，使用范围很广的方法论。它能成为共用的跨领域的元语言，也能成为科学的工具。作为科学工具，它又允许我们更加精确地解决过去的问题，也能给我们指点新的问题以及它们的解决方案。这些新的方面包括反映过程中符号系统功能的分析以及含义、认识论状态和科学造型的分析。

我们绝对意识到了使用这种方法必须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跟根本方法论相关的客观的困难之外还有这种常见的老偏见：读者看不懂的跨领域元语言有什么用处？这样的元语言为什么要做公用的元语言呢？——首先，我们要强调科学的概念与范畴统一性的好处；这毕竟自古以来是科学界思想的目标和理想。其次，我们能简单地说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的”：“假如大自然实际上不是物自体和现象的聚合体，而是一个统一的、相连的单位，我们能断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科学必须要实现一样的统一性和关联性——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都要团结起来变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单位。”（Cepikov, 1975, p. 14）

至于跨领域元语言难以看懂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出于这样的误解：关于文学写的文本必须要跟文学本身一样简单明了。绝对没有任何人期待大家都能看懂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所写的文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文学和研究文学的科学用的是同样的语言——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两者有不同的逻辑阶层^①：语言本身和元语言。不过研究文学的科学就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文学本身），因此它描述文学的时候用的是辩证性的、逻辑性的语言，而不是文学性的语言（这可能是文学论文的特征）。与这个误解相关的也是人文科学无法形式化、无法与“准确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等观点。不过所有的想要争取科学性的门类也必须要争取准确性（而准确性显然不等于科学的形式化或数学化），因为据列宁所说，“科学每一个门类都是应用逻辑”及“材料、自然规

^① 比较 Klaus, G. (1973). *Semio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7。语义阶层理论认为每个词语属于一定的逻辑阶层并且“属于一定的阶层的句子的全体构成这个阶层的语言。语义阶层理论也认为开始的时候存在着本身不是语言符号的物体、特性、关系等。这些构成所谓的零阶层。指着零阶层的符号，反映零阶层的句子与关系都属于第一阶层的语言。我们用第二阶层的语言来描述第一阶层的语言——它的符号指的是第一阶层的语言单位，它的句子描述第一阶层的语言。我们可以用第三阶层的语言来描述第二阶层的语言等。在这样的阶层系列中，我们所描述的语言是语言本身（objective language），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被称为元语言”。

□ 符号与传媒（16）

律、价值观等的抽象化，即所有的科学性的抽象化（准确的、严谨的、无争议的）都更深入地、更真实地、更丰富地反映着大自然”。（Lenin, 1954, p. 179）

苏联的哲学、认识论和科学理论/方法论在最近二十年研究符号系统理论，尤其是在分析反映的意义和理论时。通信理论和信息理论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每一个信息或通信的过程或系统同时也是符号过程或系统：没有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就没有信息和通信。就像我们不能把符号与含义隔开来，用科学的方法阐释反映理论前我们也需要先解释反映过程中符号过程的地位与功能。众所周知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解释，文学是文化中特定的领域（系统、子代码），它的意义在于用它自己的特别的反映现实的方式。由于文学有这种特别的反映的方式，因此文学作品作为成品也是现实的特定反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特定的元反映（meta-reflection）。不过，这个特定性在于哪里，也就是说文学反映现实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很少辩论的问题。这些备注无法解决我们所提到的问题，而我们想指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中，“意义”的概念属于最基本的认识论范畴。意义的分析在这里被浓缩成意义与反映、意义与概念以及意义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离不开意义与符号关系的分析，因为意义的存在离不开符号，就像没有意义的符号不是符号了（而会变成“虚空的”符号），或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符号会变成符号的“材料”“形象”。据纳尔斯基（Narskij）所说：“没有意义的符号不能存在，因为意义是符号的核心。因此，意义的存在也不能离开符号；与符号分开来的意义是虚空的。即使我们想到任何意义的时候，它也不会离开自己的载体（如内心独白或带意义的幻想），即意义只能在它的符号里面存在。”（1970, p. 5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意义和符号是同样的概念，因为“符号是意义和它的载体的一种连接”。这样有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站在符号前面的人不懂它的意义，虽然他知道这个符号是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意义是“相对独立的”，虽然“外在的客体与它的意义的连接处于主体的意识中，而这个连接是通过客体在意识中的反映而产生的”（1970, p. 57）。同样地，符号的材料以及它特定的符号结构是独立存在的，“完成的”，与意义一起运行。符号的材料（比如用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字母）“嵌入符号”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此可见，虽然意义与符号不能分开，但二者不相同。根据纳尔斯基，这个问题具有深邃的辩证性。根据阿布拉姆彦（Abramjan, 1965, p. 45），这个问题是“意义又处于又不处于符号里面”这一说法的自相矛盾的渊源。

因此一些学者给意义的定义是符号（符号“本身”）与它在意识、表现或

行为中的反映之间的关系。相反，其他的学者指出每个外在的客体在人的意识中表现为反映的图像，因此对于意义而言，重要的不是客体和它反映的关系，而是图像与它后来的功能之间产生的关系。他们把这个图像理解为心理生理过程，而不是唯心论的“特定基础”。（纳尔斯基认为这些学者包括阿布拉姆彦。）纳尔斯基自己不满足于对意义的这两种解释。经过与维也纳的新实证主义者（他们把意义与对它进行的验证的方式等同起来）、沙夫（Schaff）（他把意义缩成为“社会关系”“心理平面上的人际关系”〔1970, p. 61〕）以及维特根斯坦（他对意义的定义是“使用符号的方式”，因而意义不可避免地粉碎成无数的变体）之间的论战，他提供了自己的、如今普遍被接受的定义：“意义作为对认识论也很重要的符号学范畴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意义是用词语性的符号、非词语性的符号或符号集合体来传达的不变量的信息（invariant of information）。意义是在转变信息的过程中恒定不变的。”（1970, p. 67）不变量（invariance）这一概念对科学思维的重要性也是被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克劳斯（G. Klaus）所强调的。指着量子物理学的发现，他认为：“从现象到感官知觉到事情的本质的过渡是随着不变量（invariants）的发现而发现的。不变量是所有的有同样本质的现象（Erscheinungen）共有的。现实的真实的反映是不变量的反映。只有这个不变量才有客观的性质。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带着主观片刻的包袱的关系系统上的射影。符号学分析法的任务是在大量的可能的描述或射影中找到从一个关系系统过渡到另外的关系系统时没有变化的不变量。”（1973, p. 165）

不过，意义的分析不是唯一的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符号学领域的方式。对学习反映的过程，整个符号学的情况很重要：符号的两个成分以及阐释它们的人。符号情况运行的结果是信息。“信息是由符号结构以及它们的意义构成的。有信息就也有符号和它们的意义。因此符号和它们的意义能被视为信息的成分，即一种关系”^①，不过这种关系与沙夫的社会关系或传统的符号考察和运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只有把意义理解为功能性的关系才是合理的，而且每次情况有变化时这种关系必须要具有改变自己性质的弹性。这样唯物

^① Sovremennye problemy teorii poznania, p. 70。除了正确地把重点放在符号的社会特征上的沙夫之外，这里也需要提及热日尼科夫（L. O. Reznikov）。他认为“意义显然是词语的自然特征，它是用语音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关系”。热日尼科夫：《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列宁格勒，1964年，第23和40页。热日尼科夫在这里不可接受地把语言的符号缩成为它的语音成分，虽然语音成分只是符号的四个成分之一。德语的翻译表达得比较谨慎：*Erkenntnistheoretische Fragen der Semiotik*. Berlin, 1968. p. 33。

□ 符号与传媒（16）

辩证法认识论中的意义范畴允许我们“与科技的新发现和我们生活中信息的重要角色同时更深刻地研究认识过程和实际活动中的不同领域和情况下的反映的类型、方式和步骤”（1973, p. 81）。

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符号系统在认识的过程中有科学模型的功能。据发现，科学分析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完成很复杂的理论和实验作业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来脱离研究对象所有的具体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把解决方案复杂化。这个时候，科学家将使用科学模型来更加深入地把握很复杂和深邃的客体关系世界。除了可视化的模型之外，符号模型也越来越普遍。它们在分析过程中的功能是符号的一种应用方式。没有它，现实的理论性反映是不可能的”^①。使用符号使人的认识能力得到拓展，它能帮人把观察某种客体（即便是非物质客体）的过程换成符号程序。因此我们能使用符号模型来避免学习原作带来的困难。不过，在造型的过程中我们操作的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符号系统（即符号作为符号系统的成员），因为分析孤立的符号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关于客体或过程的信息。符号模型的构造有可能跟形式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它的边界是流动的）连在一起，不过形式化并不是它的前提。

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苏联论文更多的是符号论（semiotics）的论文（即有逻辑学特征的），而比较少的是符号学（semiology）的论文。换句话说，论文更注重哲学和交往理论，比较少注重符号学和语言学。纳尔斯基认为：“‘符号’和‘意义’的特征不属于心理学或逻辑学，而属于符号学。不过同时，它们对于认识论也很重要。”（1970, p. 68）——在这些论文中，符号被理解为信息的更高种类。他们强调的是符号不会在物质、能源或时空关系上代替所指的客体，而只会在信息关系上代替它。“每一个带着信息的物质现象都是符号。”（阿布拉姆彦，1965, p. 9, p. 36）各种各样的又具体的又抽象的、又语言的又非语言的客体都能扮演符号的角色。“符号的功能是跟完全不同的物质特征相关的——反映特征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信息。”^②

众所周知，反映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或客体的部分或现象）间互相起作用，其中一个客体是进行反映的，另一个被它反映。在反映过程

① Sovremennye problemy teorii poznania. *Poznavatelnye moznosti naucnogo modelirovaniya*, p. 418。本书还接着说：“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是一个系统组织性地和指导性地影响另一个系统的应用。它实现的方式是把结构（或结构的部分）由一个系统交给另一个系统。信息是每个反映（特别是认识反映、意识反映）的结构层面……每个认识过程都带有信息，因此都是通过符号实现的。”（第69页）

② Ursul A. D. (1975). *Metodologicke aspekty informace*. Praha: Academia, 1975. 101。在此，“完全不同”的意思是“非物质、非能源、非物理的特征”。

中所产生的认识论情况比单纯的通讯传输复杂（所认识的对象为信息的来源，认识的主体为收信人，进行认识的环境为通讯过程的渠道）。在认识的过程中编码和解码的仪器不像一般的通讯传输在一个平面上。在认识的过程中反映的客体就是处于一定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进行认识的主体（社会、科学家等）。被认识的对象是被反映的客体。反映过程中认识情况的图像如下（图 1）^①：信息是从所认识的客体传输到主体，在主体中创造出客体的“图像—反映”。在反映的过程中客体的内容是首要的，因为它是信息的来源。这一事实也出自于列宁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分离对立（disjunctive opposition）的定义。“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现实在于外在的世界，我们的感受是它的图像。对于唯心主义者而言，现实在于我们的感受与感觉，世界是‘感受的复合体’。”（1975, p. 94, p.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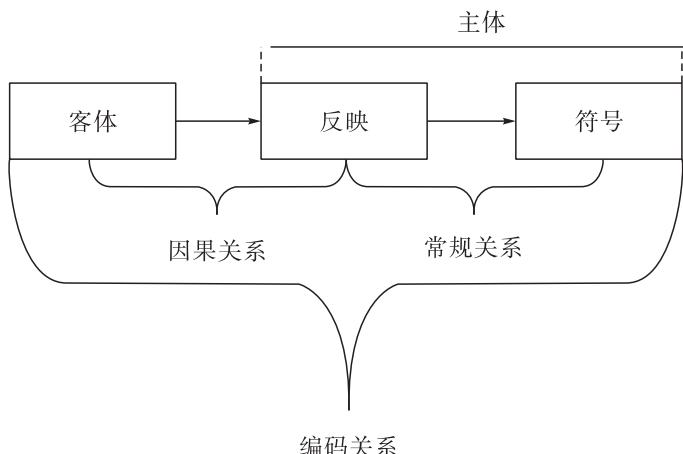


图 1

为了把信息从客体传输到主体，我们需要编码和解码的仪器。没有符号的话，这个仪器不能起作用。反映/图像的内容，也就是所保留的和属于反映和客体的（而不只是属于其中一个的），是信息的不变量（information invariant）。它自然不是所反映的客体的完整内容。在认识的过程中，编码人

^① 在描述反映过程中的认识论情况时，我们引用的是乌尔苏尔（Ursul）的理念（第 101 至 116 页），因为它比热日尼科夫或阿布拉姆彦的理念合理一些。他们的理念使用的不是“完整的符号”，而是它的某个（“内在的”或“外在的”）成分。同样地，在分析意义时，虽然他们的理念离纳尔斯基的很近，但是他们不会像他一样把意义理解为信息的不变量。不过，跟纳尔斯基和乌尔苏尔不同的是，阿布拉姆彦领悟了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即符号学的交流和纯粹的非语言示意）的区别。

□ 符号与传媒（16）

和解码人都是收信人，也就是认识过程的主体。乌尔苏尔（Ursul）认为：“在认识的过程中，符号不是反映过程之前创造的，而是反映过程之后创造的。”唯一的例外是预测的反映以及传输符号信息的符号和客体。“符号是人创造出来的或从物质的物体中选出来的，人也把符号与所反映的客体（以及最终与反映本身）搭配在一起。”（1975, p. 102）所反映的客体和反映之间发生因果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在符号和反映之间不会发生，同样也不会在符号和所反映的客体之间发生，这两者之间只会发生编码关系、标志关系。标志反映和所认识的客体的符号不会带任何有关客体的内容、结构或性质的信息。（我们认为以上的说法只描述了一些符号。比如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金甲虫》里面，从树上的头颅垂下来的甲虫的阴影是宝藏的符号〔或指标〕——它指的是发掘宝藏需要刨的地方——不过它没带任何关于宝藏内容、形式或性质的信息。）所认识的客体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用符号系统来表示，这些符号的关系、连接、顺序等都是同样的，都是认识过程的成分。这却不意味着符号本身没有任何信息内容，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在通讯方面成为符号，也不能代替另外的客体（关系、现象）。符号本身的信息价值是具体的情况决定的。

乌尔苏尔和纳尔斯基把标志理解为信息编码的特殊例子。这种编码的特点是符号与客体和客体的图像同时“搭配”。该符号蕴含着客体和反映的信息内容。至于客体的内容，只有它的信息内容合乎图像，符号才会蕴含它（因为客体基本上包含着无数的信息量）。“我们用符号给客体和它的反映共有的一定的信息量（也就是信息不变量）加以编码。”（Ursul, 1975, p. 104）接下来，乌尔苏尔提及“意义”这一概念。意义在他看来与符号和反映密切相关。他给意义的定义是配有符号的信息。这个搭配是双重的：符号给客体和它的反映（图像）都加以编码，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把客体和反映理解为两个分开的概念。符号适切性的这两个方面导致了意义的两个理念——客体论和图像论（感受论）。

根据客体论，意义是符号和客体之间的呼应关系决定的。意义的客体论的使用范围是逻辑符号学和成分符号学（componential semiotics）。客体可以是外指（实际上存在的物体）和内指（只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的物体）。根据感受论，符号的含义是逻辑或经验显现出来的图像。所谓的“合成论”想避免这两种理念的极端性，它的出发点是客体论和感受论的统一性。根据合成论，意义是属于客体和反映的信息。不过客体包含的整个信息在反映的过程中只会显现一部分，这一部分被赐予符号。但是因为在反映的过程中（就连在主

体间性的条件下),信息可能被扭曲(这样,图像也可能被扭曲),所以反映的整个信息中只有图像和客体共有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信息不变量,才会显现出符号的含义。

乌尔苏尔注意到了信息不变量的三个特殊的方面:客观、认识和逻辑方面。(客观不变量的前提是,被符号指明的客体在所指明的关系中保留着同样的信息内容,这个内容在客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不会变。认识的不变量指的是在不同的认识情况下以及在不同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下,反映/图像会保留它的信息内容。逻辑的不变量指的是在图像所有的正确的精神改变时,逻辑图像的信息内容不变。)经过仔细的语义论和语用论信息理念的分析,再经过反映的三种类型的指明(反映本身、互相的反映和自我反映)——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同中的呼应”(因为被反映的和进行反映的之间都有区别)——乌尔苏尔对反映自己下了个定义:“反映是物质系统(或它们的部分)互相之间起的作用,这作用导致了系统(或它们的部分)之间发生一定的呼应——一个系统(进行反映的)的内容与另一个系统(被反映的)的内容契合。”(Ursul, 1975, p. 143)。判断应和的标准是我们所提到的三个方面(逻辑、认识、客观)和各种等价。

经过许多对各种定义和观点的描述之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批评并重新解释。虽然我们对乌尔苏尔全面的理念表示肯定——这就是我们选了乌尔苏尔的理念而没选阿布拉姆彦或热日尼科夫理念的原因——但我们认为该理念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个重要的缺点是 Ursul 把反映和图像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并随意地使用这两个词。因此读者错误地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词。虽然图像是反映的一种或反映的一部分,或在某种程度上与反映相等,但我们并不能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比如,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说法:“指明我们认识过程的反映和客体的符号不包含有关客体内容、结构或特性的信息。只有客体的图像才包含着这些信息。”(Ursul, 1975, p. 103)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符号的种类都不包含有关客体的“内容、结构或特性”的信息,而只是符号的一些种类(如语言符号中的“指标”[indexes])。符号并不需要与它指的客体相似(只有符号的一小部分与客体相似,它们是“自然的”:例如象形字、汉字、语言符号中的象声词等),虽然如此符号也会包含有关它指的客体的信息,不然它不再是符号了。作者本人在另外的地方承认符号的信息价值,因为没有它符号就会失去符号的功能。而且如果图像(根据作者只有图像能带有关客体的信息)与反映不一致,不是符号的一部分,它在符号化(semiosis)过程中的地位在何处呢?是反映的结果吗?就连在图像与反映一

□ 符号与传媒（16）

致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一种减少，是索绪尔的“精神图像”。如果有关客体的信息真的只有客体的图像才会包含（就算“图像”是精神现象），而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包含它，那么盲人的智能必定会落后——这显然不对。同样，作者承认符号指明的是认识过程的图像与客体，因此他的“符号在反映发生之后才会产生”这一论点不正确，因为这样它与客体不能有关系。或者反映后有新的（充实的）符号产生？很可惜我们无法得知在反映过程中符号会发生什么。

同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同意以下的说法：“内容或意义是被赋予某种符号的信息。”（Ursul, 1975, p. 104）这是因为意义不能被赋予符号，符号本身有意义——我们知道符号是意义（内容）与表意的不可分割的复合体。这样阿布拉姆彦想避免的意义两面性就会出现。（Abramjan, 1965, p. 139）同样，如果符号是反映之后才创造的，编码关系不可能在客体与符号之间存在，因为只有符号才能进行编码，同时在乌尔苏尔的图像中，符号是反映之后才创造的。

在越南籍的哲学家特浩（Tran Duc Thao）的著作中，“反映—图像”的领域比乌尔苏尔的更加细腻^①。他的动机很可能来自受胡塞尔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试图着把唯物辩证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联合起来。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达到了有吸引力、相似于唯物主义、非常明智的水平。胡塞尔没有否定意识所观察到的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胡塞尔对它置之不理并且只专注于他认为是唯一的无可置疑的现象：内在的经验本身。他观察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以及他的“感受”，另一方面是主体所观察的客体，即“意向客体”（intentional object）。开始的时候意向客体与真实的客体有所区别，但在现象学思维的过程中（或结果中），真实的客体将融为意向客体。因此外在世界制约于主观意识的意向性。

特浩在自己的理论中，证明了现象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相容性。这个理论的基础为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的重新评价，他的出发点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所讨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以及他对物质的定义：“物质是我们能够感受的客观事实。”“物质是一种哲学范畴，它指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客观事实。物质是感受所复制的、拍摄的、反

^① Thao, T. D. (1975). *De la phénoménologie à la 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 de la conscience I, II*. Paris: La nouvelle critique, n. 79/80 & n. 86, 37–42, 23–30. 作者也提及他196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唯物辩证法的现象学》（我们所引用的论文出自本书的第二版）与1965年在河内出版的《关于语言和意识的起源》。

映的，它的存在是与意识分开的。”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是列宁提到的三个关系：1. 客观事实，如物质或外在世界；2. 我们的感受，即物质的反映；3. 我们，即有感受能力的主体（认识的主体）。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1. 客观事实与感受主体的现实关系；2. 主体与他的感受和意识的属性关系；3. 感受与客观事实的等同关系，感受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这三个关系一起提供了意识和客体的关系认识论辩证法的定义：客观事实是通过感受和感情赋予人的，感情与感受是客观事实的图像。（唯心主义中，这三个关系减为两个，因为外在世界变成了“感受的复合体”。）最后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这种关系，主体能够把外在世界的客观事实与他自己的感受图像区分开来。

不过，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只能通过感受的图像来把握外在世界，有什么样的物质运动创造了反映着外在世界的瞬间？为这个问题找答案时，作者写了一个复杂的运算法则，对作者有巨大帮助的是简单的指标手势作为原始的符号（早就被猴子使用的）^① 以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它的两个成分——能指与所指。根据索绪尔，“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东西和名称，而是概念和语音图像。语音图像不是物质上的语音、纯属物理的东西，而是心理上的印记（l’empreinte）、语音的心理脚印……语言符号也就是有两个形象的心理实体……”，另外，“我们研究自己的言语的时候，我们语音图像的心理性质会很清晰地显示出来。我们的嘴唇和舌头毫无动作的时候，我们也能进行内心独白，在心里默诵诗歌等”（saussure, 1916, p. 91, p. 98）。虽然索绪尔的符号学构想对于特浩有启发的作用，但是作者也注意到了它的严重的缺点。除了他过于偏重的语音传统主义之外，他也把语言完全放置于意识层面上，把语言从产生人的社交的物质活动中撤出来，并且也很明显地受到了陈旧的、今天已过时的心理学的影响，因为“内心独白”作为纯粹的心理活动不能与实际的动作、语音和比画分割开来。心理活动出自于物质上的能指，作者认为，比方说人的舌头有缺陷能导致他心理活动变得更慢。

心理上的能指作为“心理印记”不可避免地出于物质上的能指，它的“印记”是准确的心理复制品，就是因为有了物质上的能指，语言才能介于社交实践与意识的内心活动之间。但是我们对心理和物质的能指进行区分的时候，我们必然也知道所指也存在着如此的双面性，即客观的、不属于意识的

^① Spirkin, A. G. (1971). *Ucebnice marxistické filozofie*. Praha: Svoboda. Povod vedomia, Moskva: Osveta, 1960. 65–68. 引用于 Thao, n. 86, p. 25.

□ 符号与传媒 (16)

所指与心理上的所指。当我们分析物质层面上的迹象的动作时（图 2），我们发现它呈现了从有感受的主体向所指的客体的动作趋势的图像，这个图像基本上不包括意识。右边（在上面的系列中），迹象的比画产生了最基本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经验关系。同时，我们也能用抽象化来区分处于感觉—运动 (sensomotoric) 层面上的图像，即指向客体的主体之趋势图像。这个图像证明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事实，也就是猴子也能够理解这种图像，因为它们的感受纯属感觉——运动层面。作者认为这个趋势图像是比画的客观所指，比画充当了物质能指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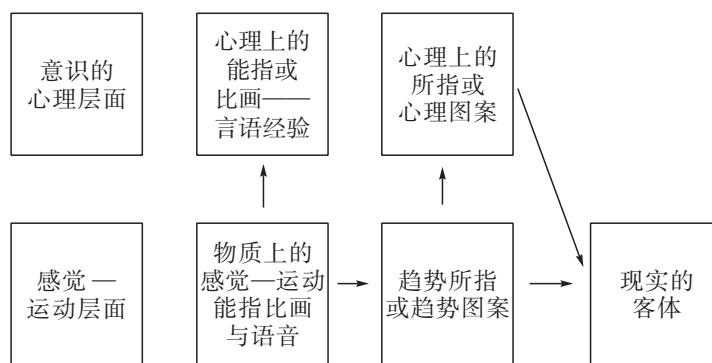


图 2

图像中，我们看到所指与感觉—运动层面上的趋势图像与意识的心理图像都直接指向外在的现实客体，趋势比画或心理活动都能够达到这个客体。也就是说所指是意识层面上和感觉—运动层面上的客体外在性与主体的关系的图像。意识和感觉—运动这两个系列都在现实的客体上相遇。作者认为这张图像有普遍的性质并且能使用于所有的运动符号过程，因为象征符号（如绘画、雕塑、建筑等）都能出自于比画运动。作者把这种心理能指（人所经历的比画—言语 (gestic-verbal) 的行为，它是用思维来复制物质的比画—言语能指）对比于胡塞尔的“noesis”（意识主体的思维活动），因为它缺少了迹象的真实运动。同时心理所指（即在物质的感觉—运动层面上反映着趋势所指图像的心理图像）把胡塞尔的“noema”定义为“意向的客体”，不过它也有缺点，因为它缺少了复制客体外在性与主体的关系的基本关头：也就是现实客体的心理外在性图像。

这个非常微妙的符号过程补充了乌尔苏尔所提到的模棱两可的、不完整的“图像”“反映”或“反映—图像”。

有趣的是，特浩分析认识论情况的构想很接近发表于《明示作为人际交往偏极案例，以及它在艺术中的意义》(Osolsobe, 1967, pp. 2—23) 中的奥索尔索伯 (Ivo Osolsobe) 的想法。奥索尔索伯作品中的座右铭（这段话同时也被沙夫引用于自己的《符号学导论》有关符号的章节的开头）是《格列佛游记》中的名言：“第二个建议是完全去掉所有的单词：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保持健康和简明。因为单词只是东西的名称，对于人来说更加方便的是随身携带东西来表达他们想说的概念。这种发明绝对会令人们健康和舒适，不过女性、文盲和流浪汉对此提出了抗议。科学最大的敌人就是普通老百姓。然而许多学者依然遵循着表达概念的新系统。它唯一的一个大缺点是，人想要表达一个很大或很繁杂的概念时，他便要携带更多的东西，除非他能雇用两个强壮的佣人来帮助他……”奥索尔索伯举了小说中学者的例子来证明明示 (ostension) 是没有用符号来表意的交流 (消息)。明示是“真实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机器与机器之间或器官与器官之间的交流的区别在于人际交流的认识论性质”(1967, p. 9)。不过奥索尔索伯将明示放在交流的“底层”是不是大错特错了呢？“当我们研究其他的交流方式时，我们能把它们理解为思想交流……明示把我们送到了交流的‘底层’上，在这里我们交流的是现实。”这个“底层”的明示真的只是“底层”，也就是特浩的认识论情况的符号模式的感觉—运动层面吗？我们认为，因为感觉—运动与心理—图像两个层面都是有“团结性” (solidarity) 的，所以明示也应该处于“上层”，也就是说它应该拥有心理的能指与所指。因此明示也不可以当成零符号的交流。相反，作者也承认了它潜伏的符号性质：“如果语言不能缺少明示的话，那么明示也不能缺少语言。每一个明示交流通过意识参与着过去的语言行为。同样地，每一个语言交流在意识中激活着过去的认识和明示行为。”(1967, p. 16)

至于认识过程中符号的角色，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两个立场：我们将第一个命名为“极大的” (maximalist)，因为它把整个认识论系统理解为符号过程。迪宁 (B. S. Dynin) 认为：“认识论系统是由实用的、符号的和句法的成分组成的。”^① 他也认为分析认识论系统时必须考虑这些成分：1. 第一个解释者所反映的客体；2. 客体性的上下文 (objective context)；3. 第一个解释者反映该客体的结果；4. 第一个解释者实用和心理行为的上下文；5.

^① Sovremennye problemy teorii poznania, p. 84. 迪宁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这三个方面。

□ 符号与传媒（16）

第一个解释者所选择的符号的材料；6. 符号上下文，即符号系统；7. 符号的发出产生的第二个解释者态度的变化；8. 第二个解释者的上下文；9. 第二个解释者对符号的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处的客体性上下文。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苏联的作者不会注意个别的符号，这样的操作他们认为不符合科学，因为它的信息价值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提及的都是符号系统，符号系统当中符号都在重复。同样地，解释者也最少需要两个。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极小的”（minimalist）观念，它把反映（很重要的认识论工具^①）与符号性分割开来。这个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心，它将符号学与反映理论连在一起，将符号与反映客体的关系连在一起。热日尼科夫认为“符号与反映的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符号的意义进行的，也就是通过意识中客体的反映进行的”（1964, p. 30）。不过，苏联作品里面的意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被定义为信息不变量，同时意义被理解为符号与客体的关系。然而，意义两面性（特别在词语符号中）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有趣的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克劳斯^②的认识论的符号观念。他的出发点是四个因素：1. 心理反映的客体（O）；2. 语言符号（Z）；3. 心理的“Abbilder”“反映—图像”（A）；4. 使用符号的人（M）。这四个因素的十二个二分法关系的例子中，克劳斯把其中的1到3号关系（以及它们的转变）看成纯粹的符号关系：

- | | |
|-------------|--------------|
| 1. R (Z, A) | 1'. R (A, Z) |
| 2. R (Z, O) | 2'. R (O, Z) |
| 3. R (Z, M) | 3'. R (M, Z) |
| 4. R (A, O) | 4'. R (O, A) |

① 这来自于列宁对象形字观念的批评的不正确的解释。阿布拉姆彦说：“符号和符号系统与外在世界的概念与他们认识论图像的区别，是把它们当成单独的领域（Zwischenwelt）的原因，这个领域和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第17页）

② Klaus, G., 同前书, p. 67。作者给关联程序再加上另外的关联，即 R (Z, E)。Z 指的是符号的形式、形状（Zeichengestalt），E 指的是具体的符号（Zeichenexemplar）。我们必须提及的是克劳斯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物质的符号、声波、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山或纸上的黑字，而是符号形式 Zeichengestalt……每一个物质的符号 Zeichenexemplar 是具体的个体，不能重复，因此它具有许多对符号学思想没有任何重要性的特征。唯一的重要的是所有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都相似，都有同样的形状 Gestalt。符号学研究的便是符号形式 Zeichengestalt。”这里就是我们理解的符号过程的区别：在某些问题上使用符号学方法的文学理论不会使用抽象的 Zeichengestalten，而把文学符号当成具体的 Zeichenexemplaren。对它来说，把这两个概念分清楚不重要（除非是历史诗学领域，如文类学 genology）。虽然这里的符号都是被反映的文学虚构作品，但是对它来说，这里的“许多特征”，个别的、无法重复的特征是非常有意思的。克劳斯认为这些特征是无关紧要的。

- | | |
|-------------|--------------|
| 5. R (A, M) | 5'. R (M, A) |
| 6. R (O, M) | 6'. R (M, O) |

关系的其他类型（4到6以及它们的转变）根据克劳斯形成了其他学科的对象（比如具体的符号 Z, Z', Z'' 等之间的关系或具体的反映 A, A', A'' 等之间的关系是辩证逻辑学的对象。 A 和 M 之间或 O 和 M 之间的关系是实用学的对象）。克劳斯的图像说明了这些关联领域的关系（图3）。它基本的成分是语言符号（单词、句子等），它们与使用符号的人之间有着实用学的关系，它们与其他的符号之间有着句法学的关系。如此看，克劳斯的图像展示了符号学关系的普遍模式（相当于 Peirce, Morris, Richards, Ogden 或理论—信息模式）。不过他的图像更清楚地说明了符号学的符号领域，他把符号与客体的关系归入他新创建的“sigmatics”，同时他只把符号与心理反映（概念、表达）关系的分析法留给符号学。他试图把过去的区分法变得现代化了。这过去的区分法早就被斯多亚学派所使用，后来弗雷格（Frege）用“Sinn”和“Bedeutung”两个概念的区别来表达它。根据弗雷格，单词或名称的意义是它的概念（Begriff），意义没有客体。句子的意义在于表达（Aussage），它的意义却不是“具体内容”（Sachverhalt），而是它真实性的价值（Wahreheitsw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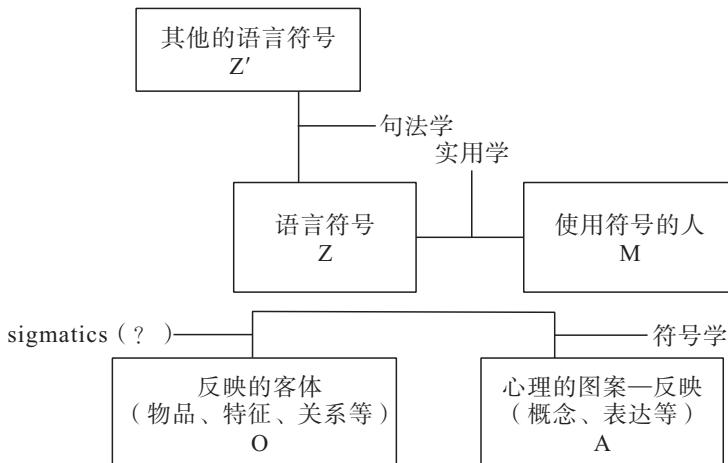


图3

($Z=Zeichen$, $A=Abbild$, $O=Objekt$, $M=Menschen$)

□ 符号与传媒（16）

克劳斯仔细地研究了客体和反映的关系，它接近了纳尔斯基的意义构想^①。对他的思维有巨大影响的主要是玻恩（Born）对量子物理学的一种奇妙的现象的解释。这个现象在于基本粒子表现出来逻辑上应该互相排斥的特征：基本粒子在空间里面分布成微粒和波浪两种形式。后来的研究结果却显示，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基本粒子的形式（微粒或波浪形式）也会改变。玻恩把这种现象（Physik im Wandel meiner Zeit）比较于一个几何体同时被投射到两个不同的平面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发现真相的关键在于不变量的概念。克劳斯的结语是：“发现不变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现象到东西的真面目的过渡。现实真正的反映是一定的不变量的反映。只有这种不变量才有客观的性质。”（1973, p. 165）

因此，文学理论只能用比喻来提及文学作品中“现实的真实反映”吗？“真实”的反映是不变量的反映，这样它不会失去反映的性质而变成纯粹的冗词（tautology）、同义反复吗？我们却认为，我们将文学反映的特异性看成特定的元反映（meta-reflection）时，情况会有一定的变化。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文学反映是过去认识反映的反映，因此它是元反映：所反映的反映（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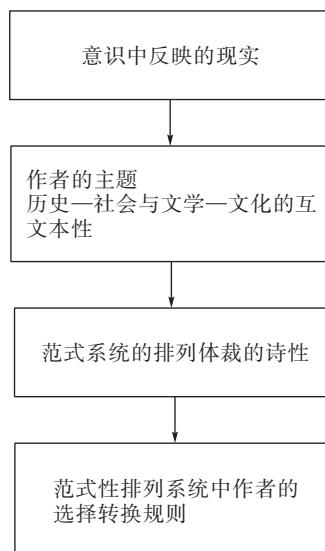


图 4

^① 这绝对不是两个人相互影响的结果（克劳斯著作的第一版是 1962 年出版的），而显然是和解决方案的水平相关的，因为解决方案的提出显得非常明显。“虽然想法就像春天的花朵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但是它们都是在太阳照耀的地方长出来的。”（引用于 *Sovremennye problemy teorii poznania*, p. 370）这也是和 *Pravda*（1975 年 10 月）提出来的批评相关的。它的批评指出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足够地关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这个元反映的领域是多层次的范式领域，它涉及作者的选择行为，他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历史、社会和阶级思想，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题，巴赫金式的互文本性（作为陌生声音的交界处，即过去和现代文本的复制和整合），具体体裁的编码，作者个人体裁的诗性，他个人的风格与写作过程等。另一方面，元反映的地方，故事（*fabula*），是等价关系的转换系列的“生成器”。^①

它基本上是一个“转变”的地方，一个存在的模式转变成另外的一种模式的地方，在这个模式中作者还是个完整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所“选择的代替人”，即讲述者，还没开始起作用，不过作者在这里已经开始选择讲述者的样子（第一个选择：讲述者的整体类型——亲身或非亲身的讲述。第二个选择：讲述者的具体类型——作者式的、个人的、直接的、中性的、“镜头式的”等讲述者。再选：讲述方式——口头叙述、描述、消息、对话、内心独白等）。这是一个进行决定/程序的地方，它整体上决定了话语（*subject*）的宏文本（*macrotext*）的其他基本门类（人物、情节和时空的计划）以及话语更低的文本环节：主题和叙次。在这个地方，作者从意识中认识论的现实反映中进行着严谨的美学选择，这个选择是体裁的目的性以及所有的其他的以上说明的故事的门类所决定的。在这个地方，作者创造边界，把反映出来的现实围起来，把它从不间断的认识论的反映流程“撤出来”。在这个地方，作者也对作品的主题进行着操作：开头和结尾，增加或不增加某种框架，情节层次和焦点的时空分布等。同时在故事的深度层面上，人物的整体“句法”也已勾勒出来了（在符号学的意义上是“角色”关系的系统）。

在艺术反映的运算法则中，作者进行选择的阶段与接下来的阶段密切相关。这个阶段在于所选择的材料的整体组合，即转换机制。这个阶段内，故事的不同门类“浮出”到表面上来，变成作品话语的门类。话语作为“表面上”的系统只能通过它下面系统的支撑而生存下来，下面的系统是故事。如果这个基础性的、深层的、生成性的系统不灵，话语只是一链缺乏叙事结构的句子、非符号化的文本，只是纯粹的言语行为。虽然故事是深层的，排在话语前面的层面，但是它们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我们不能说只是故事影响着话语（F→S），不能说两者的关系是单向的；同样地，话语也反过来影响着

^① 这个问题我们在另外的地方更加仔细地描述了，见 Stavba sujetu ako vyber z paradigm, *Slovenska literatura* 18, 1971, 32–50. Dve segmantacne roviny epickeho textu, *Slovenska literatura* 19, 1972, 221–245. Geneza literarneho textu, *Slovenska literatura*, 21, 1974, 34–50. Semiologia/semiotika v marxistickej teorii literatury, *Slovenska literatura*, 22, 1975, 105–118.

□ 符号与传媒（16）

故事（S→F）。故事和话语这两个基本领域之间的关系，允许我们分析文学文本的产生。文学文本产生的分析法经常被忽略（或被处理得很粗鲁），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直在强调过程、运动本身，它“完成的形式只是过渡性的配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作是与它的对象相关的。工作被对象化了，对象被产生了。原来在工作人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运动，现在是物品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形式。”（Marx, 1959, p. 204）完成的产品（艺术作品）与它产生的过程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不能更加巧妙地表达出来。工作的运动是在产生的物品上积存下来的，话语可以被理解为“运动的安定形式”，我们能在两个层面上研究产生的过程：在话语的“表面”层面上以及故事的深度层面上（故事是过程本身）。这两个基本领域的互作用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对文学交流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教育性的作用，它是文学反映过程真正的分析法。文学反映的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加深入地、更加先进地发掘作者的门类^①，因为结构主义的作品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个事实与故事研究上同样的缺点也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形式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研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klovskij）最近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关于他第一本书《散文理论》，他说书中概括了他对话语的观点与经验。他最后的一本《迷路之力》（Energiapobludenia）弥补了第一本的缺点，讲述了他对故事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说：“生活就是在生活的变体当中选择其中一个。每次，每天，几乎个小时，人都要面对选择。选择时而大，时而小。跟生活一样，艺术中也有这样的道理，尤其是文学。作者选择题目、人物、类型等都是在变体中选。我再一次强调变体（variant）这个词。作者在变体当中自由地选择其中一个。但没有人能确认他所选择的变体是正确的。一旦作者走上了迷津，走着走着，

① 巴赫金非常有趣地思索着我们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描述作品中的作者“角色”。他认为作者有两种：“纯粹”的作者和“部分”的作者。更准确地说，作者的角色是矛盾体（contradiccio in adjecto）。这意味着作者的角色实在奇怪，与作品中其他的角色截然不同，不过他也是属于自己作者的角色。“部分的作者”是作品中用第一人称出现的，是自传里面的人物（自传、日记、回忆录、抒情英雄等）。这些部分的作者是由与作者一人的关系决定的，都是被介绍的人物，都拥有自己的作者。我们也能提到“纯粹的作者”。“不过这也不意味着纯粹的作者与作者一人之间是没有过渡阶段的。这样的过渡显然涉及最深处的空间，人最深邃的本质，但是这个内在的空间不能成为作品本身的图像之一。作品的整体包含了它，它是在最高的程度上实现的，但从来都不能成为它图像中的组成部分。”纯粹的作者不是“被创造的本质（naturacreata），也不是被创造又进行着创造的本质（naturanaturata et creans），而是纯粹的没有被创造的而自己进行着创造的本质（naturacreans et non creata）”（Bachtin, M. M. (1976). Problema teksta. Voprosy literatury. (10th ed.). 123—151）。巴赫金的“纯粹作者最深度的空间”“纯粹的没有被创造的而自己进行着创造的本质”很接近我们理解的“深度”虚构的基本范畴的作者。它的“部分作者”接近我们的直接的、亲身的讲述者。

有的时候他会指破迷津，但有时候不会。在此我们回到了本书的书名《迷路之力》，即在迷路的时候创作的人使出的精力。”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个精力的硕果比如有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变体小说《结局好一切就好》。同样《安娜·卡列尼娜》也有几本变体。这些变体是作者范式中实现的选择。我们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要在文学反映的过程中强调深度层面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这个深度的层面（故事、深层结构、生成文本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个基本的深度基础在每个作品的时间轴上是完整产品的前提（*prius*, “ante”），它对作品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把故事描述为话语的范式储存时，这就是我们的意思。也就是说故事是话语中实现的变体中的选择可能性，举例时我们说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Krausova, 1969, pp. 5–35）。属于作者深度层面的机制是选择的规则，就是很复杂的范式系统中的排列和选择规则^①。因此，它是一个二分法的过程：1. 范式的产生；2. 系统化排列的范式中的选择。我们认为作者创造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完整的，因为作者不断地对范式进行加工和重构（我们所说的作者从一个作品到另一个作品的发展和进步）。至于有特权的读者（如文学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他把范式系统做成科学模式，并且对它进行重构：1. 产生过程的分析；2. 完成的作品，话语的分析；3. 该体裁的诗性以及作者的诗性。我们认为这个二分法过程的分析（如果理论家对它进行了充分的重构）能够当成文学反映的一种模式。对文学作品深层领域的忽略不仅仅对分析法本身造成了损失，而且也否定了我们当代生活中的一部分。日维机策夫（V. A. Zvegincev）这样描述了它：“有时候发生的全球巨大的现象要求我们接受新的思维方式。最近的生态圈和生物圈的发现是一个例子。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具有普遍性的和重要性的事件。我们显然必须要考虑和生态圈类似的心理环境，所谓的心理圈（psychosphere）。”（1979, pp. 67–68）如果生物圈保证了人的生理存在，那么心理圈对它有不可分割的弥补作用。我们把心理圈理解为我们心理、意识形态、智能生活的精神空间，一生一世把我们围起来的空间。不过它是不确定的、不封闭的世界普遍意识的“缄默范式”。每个文学反映过程中包含的深度阶层的观念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范式（paradigm）指的是经验材料的排列和组成。我们理解的范式不是 *a priori*（存在的），如哲学的格式塔学派（gestaltism）所说（根据这个学派，人一开始就对事物有部分的或全面的理解）。范式是按照生活或理论经验逐渐组成的，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如果我们把故事理解为范式的深层系统，那么范式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方法论的机制，我们用它来对生活和理论经验的领域进行分类、说明、表达和系统化。

□ 符号与传媒 (16)

引用文献:

- Abramjan L. A. (1965). *Gnoseologiceskije problemy teorii znakov*. Jerevan, ARM: Izd. An Armjan.
- Cepikov, M. G. (1975). *Integracija nauki*. Moskva, RUS: Izd. Nauka.
- Husserl, E. (1968).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Tubingen, GER: Max Niemeyer Verlag.
- Klaus, G. (1973). *Semio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GER: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 Krausova, N. (1969). *K teorii sujetu*. In: N. K. /J. Stevcek/F. Miko (Hgg.). *Problemy sujetu*. Bratislava, SVK: Litteraria 12.
- Lenin, V. I. (1961). Filozoficke zosity. *Spisy (zvazok 38)*. Bratislava, SVK: SVPL.
- Lenin, V. I. (1975). *Materialismus a empiriokriticismus*. Praha, CZE: Svoboda.
- Marx, K. (1959). *Kapital I*. Bratislava, SVK: SVPL.
- Narskij, I. S. (1970). Sovremennye problemy teorii poznania dialekticeskogo materialisma. *Problema znacenija znaka*. Moskva, RUS: Znanije.
- Osolsobe, I. (1967). *Ostenze jako mezni pripad lidskeho sdelovani a její vyznam pro umeni*. Praha, CZE: Estetika.
- Reznikov, L. O. (1964). *Gnoseologiceskije voprosy semiotiky*. Leningrad, RUS: Leningradskij gosudarstvennyj universitet imeni, .
- Saussure, F.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Paris, FRA: Payot.
- Sklovskij, V. (1980). *Varianty zivota*. Praha, CZE: Nove slovo.
- Thao, T. D. (1975). *De la phenomenologie a la dialectique materialiste de la conscience I, II*. Paris, FRA: La nouvelle critique.
- Ursul, A. D. (1975). *Metodologicke aspekyt informace*. Praha, FRA: Academia.
- Zvegincev, V. A. (1979). *K voprosu o prirode jazyka*. Moskva, RUS: Voprosy filozofiji.

作者简介:

诺拉·克劳索瓦 (1920—2009)，斯洛伐克科学院世界文学与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符号学命题。

Author:

Nora Krausova (1920—2009),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Word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His academic interest was Marxist semio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译者简介:

陆优然 (Jiri Lutka)，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Translators:

Jiri Lutk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jerry@enlightcd.com